

台湾研究·政治 2012 年第 5 期

蓝绿政党意识形态对台湾网络舆论影响初探

——基于“陈光标赴台捐款事件”台湾网民意见框架的内容分析

乐 媛 刘君琳*

在台湾,主流媒体为蓝绿政党意识形态所操控的现状已遭到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两岸学界的关注与批评。互联网的出现为台湾民众摆脱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与话语霸权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在相对自由平等的网络公共空间里,网民的蓝绿意识形态、政治偏向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舆论的走向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2011 年的“陈光标赴台捐款”事件引发了台湾网民的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并为研究蓝绿意识形态对台湾网络舆论的影响提供了合适个案。就此本文尝试引用“框架”这一概念来探索和解释台湾政党意识形态冲突对当地网络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 台湾政党意识形态与媒体框架

政党意识形态是如何参与到媒体建构过程中并影响舆论的走向,一直是政治传播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这其中,框架机制被认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认为,人总是积极地对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加以分类、组织、诠释,以求理解。而用以定位、了解各种资讯的工具就是一种“诠释基模”,或称作“框架”^[1]。吉特林(Gitlin)则将框架定义为“持续地选择、强调及排除的过程”^[2]。在对美国新闻报道的研究中,恩特曼(Entman)提出了较为广泛接受的定义:“框架主要牵涉了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件的意思,是将对这件事所认知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3]。这意味着媒体在报道社会事件时往往采用特定的报道框架来呈现社会真实,这是一个经过选择和凸显的过程,被认为是一种“意念的再现”,而政治意识形态是这种意念的重要来源之一^[4]。然而“意识形态”的概念甚是复杂,通常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可以阐释为“形形色色的对人、对社会以及同人与社会相关的宇宙的全盘性认识和道德信仰类型中的一种”^[5]。而这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常被定义为用于解释社会应该实现何种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态度与价值^[6]。在台湾的语境下,政治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主流的两种颜色:信仰三民主义、保卫“中华民国”、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反“台独”的蓝色和主张台湾“本土化”、台湾“国家认同”、台湾“独立”的绿色^[7]。而蓝绿这两种颜色及所代表的台湾主流的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和民进党,成为台湾政治光谱中最重要的政治分野。

正是由于台湾政治的这种高度意识形态性,使得各种政治力量竭力拥有或争取媒体的支持,媒体因被政党操纵而没能成为民主社会中的“第四权”^[8]。相反,在蓝绿对抗政治格局下,岛内媒体分化为亲绿媒体与亲蓝媒体,在台湾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曾经支持国民党李登辉的《自由时报》已转变为支持民进党与泛绿阵营;支持国民党的《中国时报》在民进党执政后因财政压力政治倾向有所转向,后来重新转变为亲蓝媒体;《联合报》则是一贯支持国民党或泛蓝阵营^[9]。这种分化需要大众传媒在建构甚至是放大这种意识形态冲突的过程中采取具有偏向的立场,“框架”被认为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机制。

* 乐媛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文学博士;刘君琳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超越制度决定论:两岸互联网政治参与比较研究”(编号 2010221085)系列成果之一。

意识形态与框架的关系是复杂的:首先,就新闻制作的角度而言,意识形态支配着新闻叙事框架的建立^[10];其次,就受众解读新闻的角度而言,党派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了受众对事件的看法^[11];最后,报道框架改变了受众的意识形态与情感的关系,在不同的报道框架下,意识形态对受众情感的影响显著不同^[12]。也就是说,不同的意识形态会影响与其政治上亲密的媒体的报道框架,同时也影响了受众对于媒体报道的解读。而由于媒体受意识形态影响采用差异的报道框架,也会对受众自身的意识形态及对党派的情感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即使是面对同一社会事件,亲蓝或亲绿的媒体很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框架来报道,而这一过程会进一步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解读,进而可能改变(包括强化、削弱和转变)受众的政治情感。尽管这些发现几乎是来源于传统大众媒体的研究,但仍然为我们理解台湾网络舆论的意识形态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本文尝试回答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在面对涉及两岸的话题争论中,台湾网民是否采用差异的“框架”来解读同一事件,并展现出不同的态度取向?这种差异又是否与现存的蓝绿政治意识相关联?

(二)“陈光标事件”:台湾网络舆论中的四种竞争框架

作为牵动两岸敏感神经的社会事件,2011年1月大陆富商陈光标赴台捐款济贫的行为引来了台湾民众的激烈争论。在陈光标赴台前,台湾各党派以及民众就该不该允许其来台展开讨论;陈光标入台后,台湾各界继续就陈光标做慈善的方式、目的和影响发表多种看法;即使于陈光标2月1日离台后,争论仍然继续。据观察,这一事件引发的多方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包括了三组关键词“中国大陆”和“台湾”、“富商”和“济贫”以及“高调”与“尊严”。换言之,民众的争论是因为他们以不同的框架来解释这一事件。戈夫曼认为,框架就是“对社会情境的定义”,也是人们与外在环境互动过程中,不断依凭过去经验并针对现状所建立的基础架构^[13]。也就是说,对社会情境的理解成为框架建构的重要“背景”,也是形成差异框架的重要原因。本文依据情境与框架的关系,将网民的意见框架归纳为四种:两岸框架、社会框架、政党框架及文化框架(见表1)。

表1 主导框架的划分与关键词

主导框架	社会情境	关键词
两岸	以两岸分隔与差异现状的社会情境作为解释框架	大陆、中国、两岸、共产党等
政党	以蓝绿政党斗争作为解释框架	富人、穷人、官宦子弟、郭台铭、社会福利、不买名牌、富豪等
阶层	以阶层差异、贫富分化等社会情境为解释框架	国民党、民进党、马政府、朱立伦、蔡英文、陈水扁等
文化	以台湾社会主流所认同的文化与传统价值作为解释框架	财大气粗、暴发户、钱墙、为善不欲人知、嗟来之食等

就“两岸框架”而言,“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对比常常与两岸关系和台湾独问题相关。台湾问题的内涵包括国共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美国打“台湾牌”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14]。两岸之间的任何微小事件都可能引发话题,在台湾岛内形成“统一”还是“分裂”的争论,并由于台湾民众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加剧。台湾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表现为泛蓝阵营(包括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和泛绿阵营(包括民进党、台联党、建国党等)的不同政治倾向。受不同意识形态左右,台湾民众(包括网民)对统独与否的敏感度并不一致。

而“富商”和“济贫”则涉及另一问题:社会阶层分化。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到2007年,台湾家庭负债与GDP的比率居亚洲之首,台湾贫富两级分化加重^[15]。大陆富商赴台捐款的行为引发台湾民众对慈善制度和阶层分化的反思。相对于媒体惯用的凸显蓝绿冲突的“政党框架”,“社会框架”(或称“阶层框架”)倾向于将问题归因于台湾社会内部出现的制度失调与阶层分化,而非“两岸统独”或“蓝绿恶斗”的泛政治化视角。

此外,另一组频频出现的关键词“高调”和“尊严”则触碰了台湾民众传统文化观念的神经。历史上大规模、多批次大陆移民纷至沓来,台湾岛内确立了中华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大陆文化在迁徙过程的多次嬗变、两岸文化曾经的隔阂、敌视的历史政治和民族教育,造成两岸文化出现差异^[16]。进而有学者指出,台湾成为至今仍保有中原传统文化余韵的地区之一^[17]。尽管两岸仍然分享共有的文化资源,但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行为在某些台湾民众看来不仅有背传统文化,而且更容易与两岸分隔多年所造成的文化差异联系在一起。

以上这四种对“陈光标事件”的解释框架在网络舆论中形成竞争态势,并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框架的显著程度会发生变化。台湾学者臧国仁指出,框架的中层次结构包括主要事件、主要事件发生前后的时间变量(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以及主要事件的归因与评估^[18]。可见,在框架的分析中,时间是个不可忽视的变量。框架分析可以有时间跨度,一定的框架可能会在新闻媒体中逐渐获得或失去其优势^[19]。因此,即使对于普通台湾民众而言,政治框架(以两岸与政党政治为社会情境)与社会框架(以阶层差异与文化认同为社会情境)有可能同时存在,但由于在不同阶段得到凸显的框架不同,网民态度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表现为网络舆论的转向。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随着事件讨论的深入,蓝绿政党倾向是否在网络舆论转向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台湾网民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是趋向共识还是分裂?

为了明确蓝绿意识形态与网络舆论之间的关联,网络发帖平台本身的意识形态偏向将作为一个重要变量予以考察。长期以来,由于泛绿意识形态所拥护的“本土意识”更倾向于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影响,在独统问题上相对泛蓝派系更为激进,因而我们假设:H1:泛绿网络平台的舆论倾向于反对陈光标赴台捐款,而泛蓝网络舆论则倾向于支持陈光标的行为。H2:蓝绿网络舆论的框架具有显著差异:泛绿的发帖平台上,网民倾向于以政治框架,即两岸独统和政党政治来解释事件;而泛蓝的发帖平台上,网民则倾向于以社会框架,即传统道德观念和贫富差距等视角作为讨论的切入点。

恩特曼曾指出,框架通常从定义问题发展为归因、道德评价和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构成整个框架构建的过程^[20]。假使蓝绿意识形态确实促使舆论框架产生差异,则其很可能也参与到了框架过程中的每个步骤,因此,我们继续假设:H3:在框架过程中,蓝绿网络舆论对该事件的定性、归因、道德评价和解决方案上均存在差异。其中,相对泛蓝网民而言,泛绿网络舆论则更倾向于将政党政治和两岸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归因工具。

二、研究方法

(一) 样本选取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选取“自由时报电子报(libertytimes.com.tw)”和“联合新闻网(udn.com)”这两个网络平台作为研究对象,理由是《自由时报》具有泛绿倾向,而《联合报》具有泛蓝倾向,二者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针对“陈光标赴台捐款”事件,我们采用全额抽样法对2011年1月24日至2月2日这10天内该事件讨论的网民回复进行取样,以每条网民回复作为分析单位,共获得的有效样本量为6874。仅分析网民回复是因为网站的主帖全部为纸质报纸上的报道,与本研究所要分析的“网络舆论”不符。

(二) 变量的操作化

本研究分别对以下重要的变量进行操作化,并且交互信度测试均满足内容分析的基本要求。^[21]:

1、意识形态:在本文中我们将泛蓝(联合报网)与泛绿(自由时报电子版)这两个网络发帖平台作为考察意识形态差异的重要变量。

2、网民态度:引入5度李克特量表(强烈反对1-强烈支持5)来测量网民对于陈光标理念及行为的态度。

3、主导框架:以社会情境与框架的建构关系为依据,将主导的解释框架划主要分为四个类别(参见表1),并以关键词来定位网民回复所采用的最主要的解释框架属于哪个类别。

4、框架过程:包括(1)定义问题,即对陈光标赴台捐款行为进行定性,分为:a.别有目的的行为;b.单纯实在的行为;c.高调行善;(2)主要归因,分为:a.两岸归因,包括两岸差异与统战意图;b.个人归因,包括陈光标个人的背景、经历、个性等因素;c.社会归因,包括贫富不均、社会福利体制等问题;d.政治归因,包括蓝/绿政府无能等;(3)道德评价,分为两种:a.认为陈光标的行为是有损尊严的“恶举”;b.认为陈光标捐款是可取的善举;(4)解决方案,包括:a.不应接受捐款;b.希望其改变捐款方式;c.捐款可接受;d.台湾富人应作出反应;e.台湾当局应作出反应。

5、事件发展阶段:划分为陈光标“赴台前(1月24日至1月26日)”、“入境后(1月27日至1月31日)”和“离台后(2月1日以后)”三个阶段。

三、实证数据分析

(一) 蓝绿意识形态与网民态度

将“网民态度”视作定距变量进行t检验,发现蓝绿发帖平台的网络舆论的主旨态度有显著差异。

表2 蓝绿发帖平台的主旨态度

	发帖平台	数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主旨态度	自由时报	698	2.42	1.447	.055
	联合报	3474	3.63	1.224	.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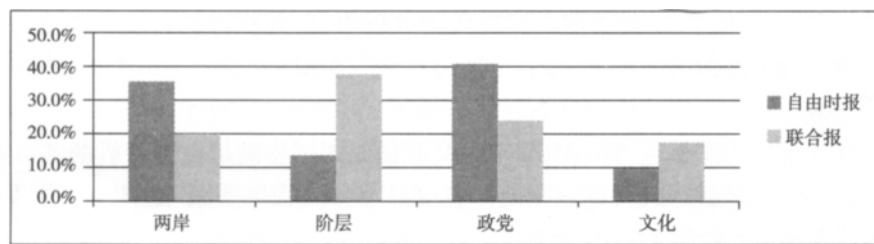
$t = -20.693$, $df = 908.067$, $p < 0.001$

由表2可见,《自由时报》发帖平台的网民态度均值为2.42,呈负面评价;而《联合报》网民的态度均值为3.63,正面评价占据主流。也就是说,假设1得到验证,泛绿的《自由时报》发帖平台的舆论倾向于反对陈光标,泛蓝的《联合报》发帖平台的舆论倾向于支持陈光标。如果说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蓝绿意识形态与网民态度倾向的因果关系,那么探索促使这一态度差异的框架过程则更为重要。

(二) 蓝绿意识形态与在线舆论框架

图1展示了在蓝绿发帖平台上,在线舆论的主导框架存在着显著差异($\chi^2 = 322.4$, $df = 3$, $p < 0.001$)。《自由时报》的网络舆论倾向于以两岸问题(35.5%)和政党政治(41.0%)作为解读事件的主导框架;而在《联合报》的发帖平台上,凸显台湾社会问题本身的阶层框架所占的比例最高(37.8%),其次是政党(24.2%)和两岸(20.3%)的框架,以传统文化为评判依据的意见比例最低(17.7%),这意味着强调“社会差异”(55.5%)相对于强调“政治对立”(44.5%)的舆论走向在联合报占有一定优势,假设2也因此得到了支持。这说明,蓝绿意识形态确实与网络舆论中所采用的框架及呈现的网民态度相关联,这意味着台湾网络舆论中也呈现出蓝绿意识形态分化的现状。

图1 蓝绿网络平台的主导框架



然而,泛蓝发帖平台上框架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确认意识形态与框架过程中具体指向性差异的关联性,如表3:

表3 蓝绿发帖平台的框架具体指向

框架	自由时报(%)	联合报(%)	检验值
定义	n = 443	n = 1585	$\chi^2 = 556.2$, $df = 2$, $p < 0.001$
别有目的的慈善行为	60.0	9.1	
单纯实在的慈善行为	21.2	53.4	
高调行善	18.7	37.5	

续表

框架	自由时报(%)	联合报(%)	检验值
主要归因	n = 727	n = 2796	$\chi^2 = 180.2$, $df = 3$, $p < 0.001$
两岸	27.8	17.3	
个人	15.5	11.3	
社会	14.6	41.2	
政治	42.1	30.3	
道德评价	n = 359	n = 1395	$\chi^2 = 192.0$, $df = 1$, $p < 0.001$
有损尊严的“恶举”	62.1	23.8	
可取的善举	37.9	76.2	
解决方案	n = 325	n = 1499	$\chi^2 = 388.2$, $df = 4$, $p < 0.001$
不应接收陈光标赴台捐款	48.9	6.9	
希望陈光标改变捐款方式	1.5	6.5	
陈光标赴台捐款可接受	30.8	52.5	
台湾富人应做出反应	12.6	19.2	
台湾当局应做出反应	6.2	14.9	

首先,如表3所示,在对“陈光标赴台捐款”一事的定义上,有60.0%的《自由时报》网民认为这是“别有目的的慈善行为”;而在《联合报》的电子平台上,超过半数(53.4%)认为这是“单纯实在的慈善行为”,其次是“高调行善”(18.7%)。这说明《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的网络舆论对“陈光标事件”的定义有显著差异($\chi^2 = 556.2$, $df = 2$, $p < 0.001$)。在舆论框架形成的过程中,泛蓝网民首先在对这一事件的定性上表现出较高的善意。

其次,蓝绿网民在这一事件的归因上也存在显著差异($\chi^2 = 180.2$, $df = 3$, $p < 0.001$)。在《自由时报》的网络舆论中,蓝绿政党政治,即党派或政治人物的无能,被认为是导致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42.1%)。其次是两岸归因(27.8%),其中,认为该事件是“中共‘统战’阴谋”(72.5%)的解释占据了泛绿网民舆论的主流,而认为该事件源于“两岸经济文化差异”(27.5%)的理由并不受重视;相反,在《联合报》网络舆论中,社会归因(41.2%),即台湾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等问题被认为要为该事件的发生负责,然后才是政党政治(30.3%)。这说明,即使作为“社会事件”,陈光标赴台捐款一事仍然被泛绿网民解读为政党无能和诟诸两岸独统问题的“政治事件”,支持了假设3的部分陈述。

最后,在对陈光标事件的道德评价($\chi^2 = 192.047$, $df = 1$, $p < 0.001$)与解决方案($\chi^2 = 388.2$, $df = 4$, $p < 0.001$)上,蓝绿网络舆论均呈现显著差异。《自由时报》的网民倾向于认为陈光标的捐款行为是“恶举”(62.1%);而在《联合报》的发帖平台上,网民倾向于认为陈光标的捐款行为是“善举”(76.2%)。此外,有接近一半的泛绿网民(48.9%)认为台湾民众不应接收陈光标赴台捐款;而联合报的网民回复中则有超半数人(52.5%)认为陈光标赴台捐款可接受。

至此,假设3“在框架过程中,蓝绿网络舆论对该事件的定性、归因、道德评价和解决方案上均存在差异。其中,相对泛蓝网民而言,泛绿网络舆论则更倾向于将政党政治和两岸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归因工具”得以验证。但是,网络舆论具有动态特征,随着事件的发展,泛蓝与泛绿的舆论取向是否发生变化及如何变化是更值得关心的议题。

(三) 蓝绿意识形态与框架的转换

图2和图3分别展示了在蓝绿发帖平台上,事件发展各阶段的舆论主导框架。数据显示,《自由时报》($\chi^2 = 48.305$, $df = 6$, $p < 0.001$)和《联合报》($\chi^2 = 128.1$, $df = 6$, $p < 0.001$)发帖平台在事件发展各阶段舆论的主导框架都呈现显著差异。

图2显示,在泛绿发帖平台上,用两岸框架(33.0%和34.1%)和政党框架(42.2%和43.4%)解释事件的网帖在事件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具有主导优势,并且在“陈光标离台后”,两岸冲突框架(52.9%)明显增加,而突出反映台湾社会内部问题的政党框架与社会框架在第三阶段出现锐减,而凸显两岸文化差异的框架则

出现锐增的趋势。这些都暗示了泛绿网络舆论有走向极端化趋势的危险。

图2 《自由时报》网络舆论框架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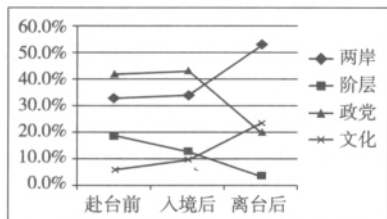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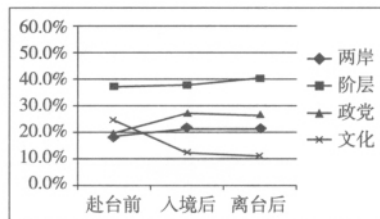


图3 《联合报》网络舆论框架走势



而在泛蓝发帖平台上(见图3),用反映阶层差异的社会框架解释事件的网帖比例一直具有明显优势,而且这种优势随着事件的发展得到了逐步强化(37.4%、38.1%和40.5%)。同时,用两岸(18.1%、21.8%和21.6%)和政党(19.6%、27.5%和27.0%)框架在陈光标入境后都有所增加,在其离台后有些许回落。唯一显示出明显减少趋势的是文化框架。总体而言,泛蓝网络舆论呈现出较温和、多元的走向,对陈光标赴台捐款这一社会事件的解读更倾向于追究台湾社会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非借此在两岸关系上做过分解读。这说明泛蓝网民之间的深入讨论在弥合两岸文化差异上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台湾的网络舆论中的确出现了蓝绿政治取向的分野:泛蓝网民倾向以社会阶层矛盾的框架来解读事件,而泛绿网民则更多以政党政治的角度切入讨论。进一步的结果显示,将社会事件“泛政治化”是泛绿网民最重要的框架机制,“政党政治”与“两岸问题”成为主要的归因工具;而“阶层矛盾”则获得泛蓝网民的重视。可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的框架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低门槛的互联网平台给予民众一定程度上摆脱“泛政治化”解读的可能性,但同时固有的政治偏向在网络中也有促使政治两极化的危险。这为我们深入理解台湾网络政治文化提供了经验性的参考依据。

(一) 两岸关系与台湾网络舆论中的“泛政治化”解读

随着国民党在2008年台湾大选中的获胜,两岸关系逐渐和缓,各项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得到沟通和深化。对于台湾民众而言,大陆的经济崛起与两岸关系的改善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社会情境。戈夫曼认为,面对不断变动的情境,人们需要透过类似“调音(Keying)”的动作转换所接触到的信息,使其或因与个人经验相关而获得接收并产生后续动作,或因与个人无关而遭到模式^[22]。“陈光标赴台捐款”本应是社会事件,而非政治事件。但其“大陆富商”的身份与其个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很可能触及长久以来两岸关系间最敏感的神经,因而蓝绿意识形态作用下的解读框架也产生了差异。

泛蓝民众由于在“台独”问题上多数持反对意见^[22],且对与大陆的经贸往来表示善意,^[23]更可能倾向于将“陈光标赴台捐款”理解为单纯的民间行为,而非政治性的解读。研究结果也显示,凸显阶层矛盾的“社会框架”一直在泛蓝网络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泛蓝网民展现了较为温和理性的一面,尝试从台湾社会内部寻找问题的根源,而只是从两岸冲突或党派斗争的角度解读事件。

与之相反,民进党作为在野党,不需要直接对台湾现状负责,因此他们的任务是指责执政党(国民党)将台湾社会的矛盾归结于执政党的无能或不作为,亦即议题的政治化操作。在网络舆论上,这表现为泛绿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框架的强调。同时,两岸关系的突破性进展作为国民党最重要的政绩之一,也自然成为了绿营的靶心。研究结果显示,认为“陈光标事件”是中共“统战”阴谋的归因成了泛绿网络舆论的主流。这更加表明,“两岸问题”已经成为泛绿网络舆论最重要的归因工具,其目的往往是打击对手的政策,与其党派利益相关。

(二) 台湾网络舆论的转向:走向共识还是分裂?

就政治传播而言,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拓展是否能够挑战旧有的传播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民意是否能够摆脱固有的意识形态偏向,进行理性讨论,从而在有达成共识的可能。研究发现,无论蓝绿意识形态

都有相当比例的舆论以政党框架解释事件,这表明蓝绿双方不同程度存在“将两岸关系矮化为台湾岛内斗争的工具”的倾向。然而我们也从研究结果中看到,泛蓝网络舆论呈现出较为温和、多元的变化趋势,这与泛绿网络舆论中的两岸框架被不断强化的现象存在明显区别。这很可能反映出网民讨论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群体极化现象。政治文化极端分布的社会公民行为往往具有极端化对立倾向^[24],而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将削弱在网络平台上争取对话共识可能性,进而导致网络政治极化的危险。

在两岸互动日趋紧密的新形势下,理解与把握台湾网络舆论的特征与动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蓝绿意识形态与网络舆论框架之间的关联,更重要的是探索互联网所提供的公共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弥合台湾社会的政治隔阂提供机遇。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台湾网民走向理性对话与政治分裂的两种可能性。

注释:

[1][13][22]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 Gitlin, J.,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3][20] Entman & Robert M.,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Vol. 43, No. 4, pp. 51 – 58.

[4] 林静伶《新闻框架与意念的再现——论题取径的分析》,《“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1999,9(4): 590 – 607。

[5] Shils, E.,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 23.

[6] Tedin, K. L.,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Vote”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1987, No. 2, pp. 63 – 94.

[7] 赵勇《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倾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 – 63页。

[8] 佟文娟《过程与分析:媒体与台湾政治民主化》,2008年厦门大学博士论文,第1页。

[9] 陈玲《台湾媒体的政治化刍议》,《新闻界》2012年第7期,第70页。

[10] 初琦、张晓宇《试从新闻价值标准看新闻叙事框架的意识形态属性》,《东南传播》2007年第4期,第39 – 40页。

[11] Boettcher & Cobb, “Echoes of Vietnam? Casualty Framing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in Iraq Author”,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6, Vol. 50, No. 6, pp. 831 – 854.

[12] Gross & D'Ambrosio, “Framing Emotional Response”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4, Vol. 25, No. 1, pp. 1 – 29.

[14] 王奇《二战后国际大环境之中的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5卷第2期,第80 – 93页。

[15] 林其屏《台湾家庭负债高的原因与影响》,《亚太经济》2008年第4期,第103 – 106页。

[16][23] 徐锋《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 – 207页。

杨建华《略论台湾民众的政治意识现状和两岸文化差异性特征及传播对策》,《东南传播》2009年第6期,第164 – 165页。

董小苹《台湾意识演变过程中的台湾青少年民族认同感发展》,《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1期,第80 – 83页。

[17] 刘国深等《台湾政治概论》,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 – 37页。

[18] 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33 – 53页。

[19]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9, Vol. 95, No. 1, pp. 1 – 37.

[21] 本研究的编码员由四位受过多次训练的研究生担任,进行两两编码。互信度测试主要选取 Cohen's kappa 来计算两个编码员之间的一致程度,网民态度(0.78),主导框架(0.85),以及框架过程中的定义问题(0.91),归因(0.83),道德评价(0.89)与解决方案(0.89)这些主要变量编码均达到内容分析的信度要求。

[22] 周丽华、陈凌雄《2007年国民党综述》,《台湾二零零七》,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23] 张冠华《未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架构研究》,《两岸关系研究报告:2006—2007年》,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24] [美] 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 – 35页。

(责任编辑 毛仲伟)